

纪念萧友梅先生

——在首都音乐界纪念会上的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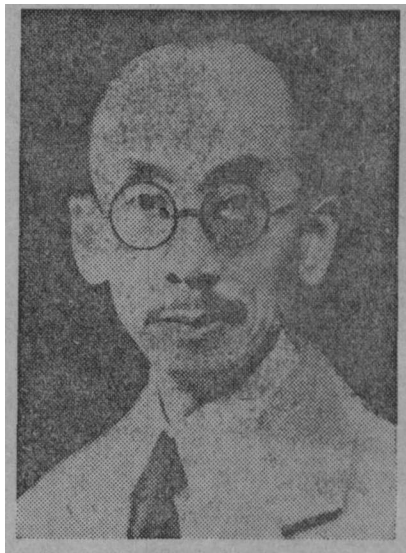
赵 沅

今天，在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今天，我们集会来纪念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先驱——萧友梅先生，我认为是有重大意义的。

过去，有些时期，对于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时常有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论点出现，这对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繁荣当前创作，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从世界观的范畴上说，萧友梅先生属于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同时，他的音乐思想中也渗透了不少儒家音乐思想。在他早年的政治活动中，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日本，他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共居处，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总统后，萧友梅先生先后任总统府秘书、教育司科长。为了赴欧洲继续研究音乐，他才脱离了政治活动。后来，他把毕生的精力，放在发展音乐教育工作上，可以说是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工作的最主要的奠基人，为我国音乐教育工作做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

萧友梅先生在作曲方面的成就也应该充分给予肯定。虽然，像萧淑娴同志曾经告诉我的那样：“萧友梅先生在北京时，忙于好几个学校的教学行政工作，像女师大音乐系、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等，由于当时军阀统治，内战频仍，教育经费经常被军阀移作战费，为此，他不得不经常奔走呼吁，以求能把这些学校维持下去，故而没有时间专心致



力于作曲，但他仍然为了教学的需要，创作了不少的作品。”

萧友梅先生的创作，充分表现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如：《五四纪念爱国歌》、《北京女界联合会歌》和《中华好》等，都是最好的例证。

萧友梅先生的音乐思想，在他的一篇《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答记者问）一文中作了很清楚的阐述。他一方面很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对传统音乐他注意其历史价值和时代思潮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很重视社会音乐生活，主张发展音乐事业要从培养师资、奖励天才和鼓励集团唱歌三方面着手。在音乐形式上，他重视音乐的民族特点，并认为无论是“改造旧乐”或是创造一个新的国民乐派，

发展交响乐事业的一些问题和建 议

谢明整理

1980年8月10日、11日晚,文化部艺术二局与中国音协创作委员会联合举办了两场交响乐新作品试奏会,由中央乐团交响乐队,中央歌剧院乐队担任试奏。这次试奏的新作品共十首,绝大部分都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作。试奏后,举行了两次座谈会,大家对这次试奏会的做法很满意,认为是扶植交响乐事业的有力措施,对从事交响乐创作的作曲家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希望这种做法能坚持下去。对于试奏的十首新作品,大家认为多数作品都有可取之处,比起五十年代的创作,在技术上是有所提高的,但除个别作品比

较完整外,大多数作品都还不够成熟,需要继续加工提高。

同志们在发言中,着重谈到了我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问题,大家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交响乐事业所取得的成绩。但是,由于十年浩劫的破坏,以及我们在音乐文化事业的管理体制上和工作上都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我国交响乐事业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

第一,交响乐事业的管理问题

目前我国除了有一批以伴奏及配乐为主的管弦乐队外,只有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和上海交响乐团是专门从事交响乐演奏的团体。这跟我们十亿人口的大国本极不相称。(罗马尼亚二千多万人口,就有十六个交响乐队,美国每个中等城市都有一个交响乐队。)由于近年来文化部门强调了用经济规律来领导文化事业的结果,使得这两个交响乐队也不可能用全部时间与精力来务“正业”了。例如:中央乐团交响乐队,除保证外国指挥专家的排练与演出外,为了完成文化部规定的经济任务和增加个人收入,其余时间全部用去为电影配音,去年搞了几部电影,今年可能更多。而新影乐团本是专门为电影配音的乐团,由于中央乐团抢了他们的生意,他们就无“正业”可干,只好去搞轻音乐演出,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又如,上海交响乐团,由于交响乐音乐会卖不出票,电影配音好赚钱,为了完成经济收入,就只好分散成小乐队去搞轻音乐赚钱。

都“不能把旧乐完全放弃”,并认为“蒐集旧民歌”和“蒐集民曲小调”、“整理旧剧”和发展新创作是发展“新时代的民众音乐”的四条必需采取的措施。

萧友梅先生在他自己创作实践上,也是遵循了这些主张的,如:他写的可以说是我国的第一首钢琴音乐的《新霓裳羽衣曲》,从结构上说,他采用了传统的序、遍、尾声的结构,在音调、和声和织体上也力求具有一定的民族特征,应该说,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是十分难能的。

过去有人认为,萧友梅先生的创作没有 在人民的音乐生活中发生很广泛的影响;又

说他在音乐教育方面主要是照搬欧美的音乐教育体制等等。我认为,类似这种说法都有一点离开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考虑问题的缺点,甚至可以说这些缺点是当时历史局限性的必然。如果考虑到在当时国家处于帝国主义的胁迫之下,人民处于水火之中,在先进的知识阶层中,人们到处去追寻救国、救民的道路,从而“实业救国”、“司法救国”、“教育救国”各种各样的主张都应时而生,萧友梅先生在当时,在政治上追随孙中山先生,因而写出了象《国土》、《国耻》、《国难歌》、《国民革命歌》、《从军歌》等一系列爱国歌曲。在教育上,他追随蔡元培先生,除了大力提倡美育教育

世界各国都把交响乐作为一个国家音乐水平高低的标志,这个事业又是需要花大量的钱才能兴办起来的,在苏联、东欧及朝鲜是完全由国家包干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绝大多数交响乐队都是由资本家资助的,每年少则几十万、多则百万元以上。象世界著名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就是由几个大财团联合资助的,全世界没有一个交响乐团是不赔钱的。现在我们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把交响乐团跟歌舞团、戏曲剧团同等对待,要交响乐团跟其他艺术团体一样去完成经济任务,事实已经证明,这对交响乐事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第二,交响乐的创作问题

我们的交响乐事业要得到发展,根本的问题,就是要使交响乐创作繁荣起来,必须经常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交响乐作品,供给交响乐队演出,但目前可供选用的作品很少。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交响乐创作的扶植很不够,交响乐是音乐艺术中一种比较高级的艺术品种,要写好一部交响乐,需要多方面修养。目前我国能够写又愿意写交响乐的作曲家并不多,据不大精确的统计,建国以来有管弦乐作品问世的作曲家全国约三十人左右。一些热爱交响乐事业的作曲家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写出一部作品来,经常是既不能出版又得不到机会演出,甚至连试奏一次的可能都没有,仅北京一地,除这次试奏的十个作品外,目前在交响乐队指挥和作曲家中的新作品,还可举行五场试奏会。音乐是听觉的

艺术,不能把音符变成音响,作曲家的劳动等于白费,一个作曲家的创作热情越高,写出的作品越多,内心的痛苦就越大。目前我国交响乐创作还处于比较幼稚的阶段、如果没有大量的作品问世,不断从创作与演出实践中来总结经验,要提高交响乐创作水平就无从谈起,没有好的作品出来,所谓发展我国民族交响乐事业就成了一句空话。

第三,指挥、演奏员的培养与更新问题

要办成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交响乐队,必须每个乐队成员都有高度的技巧和艺术修养。世界著名的交响乐团,都是集中了本国以及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组成的。他们采取招聘及合同制的办法广泛吸收人才。由于我国现行的劳动管理制度卡得太死,人员不能流动,从而堵塞了人尽其才的通道,造成人才的严重浪费。这里举几个典型的例子:①内蒙有一个吹小号的同志,原是中央乐团德国小号专家班上的优秀生,中央乐团曾去内蒙商调,地方不放,在那里又无用武之地;②西安音乐院大提琴教师赵震霄同志,是国内第一流的大提琴家,中央乐团要调,西安不放,赵感到自己的才能不能发挥,粉碎“四人帮”后就离开祖国到新加坡去了,在那里,被聘请为新加坡国家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③上海芭蕾舞团一名年青的指挥是交响乐队指挥的后起之秀,很有发展前途,中央乐团两位交响乐指挥年事已高,急需培养年青的指挥接班人,中央乐团多次跟上海有关领导商调均不同意。类似上述的情况还

之外,强调音乐“移风易俗”的作用,并且用自己的创作直接反映了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只能说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的音乐活动还不能和当时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因而他的这些主张和愿望和其他一些志士仁人的愿望一样,还不可能完全得到实现。正如列宁同志所告诉我们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见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从这一点来考虑:第一,萧友梅先生在当时是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的,这决定了

他对人民的态度;第二,从他的音乐创作,特别是音乐教育工作的成就来看,他是作了一些前人所没有作出过的事业和贡献的。因此,充分肯定萧友梅先生在我国近代音乐事业上的贡献,肯定他在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历史地位,绝不能用后来的条件和成就来衡量一个历史人物,这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让我们认真地开展一个“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在近现代音乐史上“从萧友梅到聂耳”的研究运动吧!这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文化,是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的。